

方志学研究文集

● 刘栋良/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方志学论文集

刘栋良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济南

鲁新登字01号

方志学研究文集

刘栋良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政编码：250001)

(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印刷所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9·75印张 220千字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 BN 7—209—01636—8

K.214 定价：7.80元

序

盛世修志。自80年代初，全国普遍开展地方志编纂以来，成长起一支宏大的修志队伍。这支队伍以弘扬华夏修志传统为己任，澹泊利名，戮力同心，殚情竭虑，潜心修志，使一代社会主义新志书如耀眼繁花相继问世，壮东方文明之声名，令四海神快而心慰。新志书的编纂实践，推动了方志理论的继承与创新。众人采薪，集腋成裘，融现代科学之众长，探新方志学之规律，使百科走向方志，方志面向百科，社会主义方志事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成为方志发展史上空前的胜举。

作者有幸投入这一有希望的事业，倏忽十余载，在志海中求索，年积月累，笔削不遑。爰捭拾其津梁之文，附会成集。收入文集的论文，凡37篇，多数在省以上理论刊物发表。其中，《齐乘整理琐言》，系笔者参加整理元朝名志《齐乘》之所得。文中对该志内容、体例之特色详加分析，对志中之舛误及以讹传讹者，有重要订正；《方志观——董一博方志学术思想的核心》，是笔者学习当代国内新方志理论奠基人之一董一博的论文集之体会，并融笔者的学术见解；余者皆为笔者参加各层次志书编纂中，撰写的志书概述、稿评、书评及代拟的书稿序言等。附录：《浅论城市发展道路问题》，虽非志类著作，但与志密切相关。“志之者纪其已然之迹，治之者行其当然之事”，地方志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归根到底需贴近和服务于现实，志、论正确地结合，是方志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文集问世，作者谦谦，限于理论和知识水平，错误和不当

难免，恳请学术界和读者批评与指教。

作者

1994年1月

目 录

序·····	(1)
《齐乘》整理琐言·····	(1)
方志观——董一博方志学术思想的核心·····	(13)
方志学研究对象及学科属性·····	(28)
坚持质量标准提高志书质量·····	(35)
年鉴与地方志·····	(45)
档案与史志编纂·····	(58)
城市的起源、发展与城乡建设志的编·····	(64)
中心城市区志特点及编纂实践·····	(75)
外贸志编写刍议·····	(84)
《省志·建材志》编写提要·····	(92)
县志体例与篇目的深加工·····	(101)
谈宏观经济篇的设置·····	(107)
志书应加强对建国前政治内容的记述·····	(111)
城市建设志志什么·····	(114)
城市建设志编写初探·····	(118)
城市建设志编写再探·····	(127)
着眼创新在增强志书科学性上下功夫·····	(138)
外贸志单独立志是个创举·····	(149)
新编志书质量面面观·····	(159)
冷静的回顾有利于方志的繁荣·····	(169)
地方志为现实服务大有作为·····	(182)

朴实 严谨 创新——喜读《宾阳县志》·····	(190)
一部特色鲜明的新镇志——喜读《北园镇志》·····	(198)
从新出志书看资料的重要性	
——读《青州市志》·····	(202)
评《青州市志·经济总述》·····	(213)
评《浅谈方志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220)
概述创作探微·····	(225)
《北园镇志》概述·····	(227)
《蒙阴县志》概述·····	(232)
《武城县志》概述·····	(237)
《德州市志》概述·····	(243)
《莱阳市志》概述·····	(252)
《天桥区志》区情概述·····	(262)
《天桥区志》凡例·····	(271)
《天桥区志》篇目·····	(272)
赞我山东 爱我山东 (代序) ·····	(283)
《补阙集》序·····	(285)
附：浅论城市发展道路问题·····	(287)

《齐乘》整理琐言

《齐乘》是山东省幸存下来的唯一的一部元朝以前的志书，也是全国的名志。历代的史学家对《齐乘》推挹备至，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把该书收录其内，亦称赞它“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我们在整理《齐乘》中颇多受益，深感前人对《齐乘》的褒扬，绝非溢美之辞。本文谨就我们整理之所得，琐细言之，名曰《齐乘整理琐言》。

—

《齐乘》，元代于钦私撰。于钦的生平不见于史传。据《益都县图志》、《山东通志》等书记载：于钦，字思容。山东益都人。于钦自幼博学多闻，“以文雅擅名当时”。历官国子助教、中书兵部侍郎、御史宪台都事左司员外郎、益都田赋总管。在任职期间，他感慨于当时各地均有古代志书，而山东境内因战乱兵燹，古代志书却荡然无存，遂立志撰修齐地志书，“有关于当世，有益于后人者，宜著述以彰显”。他曾对儿子于潜说：“吾生长于齐，齐之山川、分野、城邑、地土之宜，人物之秀，此疆彼界，不可不纂而纪之也。”于钦充分利用在山东致仕的方便条件，“周览原隰，询诸乡老”，“并考之《水经》、《地记》、历代沿革，门分类别，为书凡六卷，名之曰《齐乘》”，并嘱其子于潜：“吾或身先朝露，汝其刻

之。”《齐乘》成稿于元惠宗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于钦死后，于潜于元惠宗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将该书刻版付印。

《齐乘》元刻本已佚。据查北京、上海、南京、辽宁、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地理研究所、台湾及山东省淄博市，有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刻本。该刻本系明朝嘉靖年间，青州府知府杜思（字子睿）刻印，并为该书作《序》。清朝康熙年间曾有抄本，现藏于台湾省。目前全国不少地区（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为44个单位）所收藏的是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胡德琳的登州重刻本。

《齐乘》乾隆四十六年刻本，较之以前刻本更为完善。全书六卷，四本装订。卷首有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胡德琳序；明朝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杜思（子睿）序；元惠宗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苏天爵序。卷末有于潜《齐乘·释音》一卷；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于潜《跋》；清朝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周庆承《跋》。该书校勘严谨。参加校勘者：卷一，胡德琳；卷二，周嘉猷（两塍）；卷三，葛昊（容斋）；卷四，李文海（秋水）；卷五，段松苓（赤亭）；卷六，杨峒（书岩）。另每卷末并附有乾隆年间益都知府、钱塘人周嘉猷的考证，卷末有周嘉猷之子周庆承（继千）的《释音考证》。

对于《齐乘》的《考证》，在介绍《齐乘》的某些文章和辞条中，作者均书为清朝周两塍。但据胡德琳序中所云：“原书中常有舛误之处，君（指周两塍）又为考证若干条，附于各卷之后，……考证仅具草稿，余颇为是书惜！”周两塍之子周庆承的《跋》中亦说其父的考证：“草创未就，而先君子疾革，以囑门下士杨君书岩（峒）参订卒业。”据此，《齐乘考证》并非周两塍独撰，实际情况是大部分考证由杨峒完成。

《山东通志》、《益都县志》均载：“《齐乘考证》，六卷，杨峒撰。”并云：“此书无单行本，即附著《齐乘》各卷后。乾隆间，益都知县周嘉猷重刊《齐乘》，因作考证数十条，未成疾革。以囑门下士杨峒参订卒业。据原书有段松苓诸人分校、实峒总其成也。”除杨峒、周嘉猷的考证外，据《山东通志》记载，尚有清乾隆乙酉副贡、胶州人赵节（字子安，一字子勅）撰的《齐乘考证续》六卷，至今此书并未发现。《辞海》1979年版载：《齐乘》“于钦撰”，“清周雨隲有《齐乘考证》，其子周潜有《齐乘释音》”。根据前述，《辞海》所载有误：周雨隲应为周两隲；其子周潜，应为其子周庆承（字继千）；据载《齐乘释音》非周两隲之子撰，实为于钦之子于潜撰。

二

《齐乘》，“是书专记三齐輿地”。其范围以元代山东东西道宣抚司所辖益都、般阳、济南三路为主，并附述古代曾为齐邑的高唐、禹城、长清、聊城、东阿、临邑等县。相当于除今天的鲁西、鲁西南以外的山东大部分地区。今天的鲁西、鲁西南一带，即元代的东平路、济宁路、东昌路，曹州、高唐州、濮州、恩州、冠州、泰安州，当时属于燕南河北道，故《齐乘》不载。但就其所记地区范围而论，是属于通志（省志）一类，且是山东现存最早的“省志”。

我国地方志的修纂，始于战国后期，盛于六朝，普遍修纂始于宋代。通观其体例，其主流是述地一类，多记一地区地理及其沿革，兼记其他。这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齐乘》承袭了前代方志的这一格局并有所发展，是属于述地兼记人物的体例。其体裁则采用记载古今的通记体，而书其名为《齐

乘》，则是沿袭春秋时晋国的史书《晋乘》而来，作为地方志书的名称，则是首创。

《齐乘》在纲目的拟定上，依据地理总志的性质、范围和体例的要求，并考虑到齐地古志“荡然无存”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按类分门与按事分门相结合的方法，设置了沿革、分野、山川、郡邑、古迹、风土、人物等门。《沿革》以时为经，因地系事，一直上溯到远古的氏族部落；商、周的诸侯封国，以至历代的疆域变迁、政区沿革。《分野》以构成我国古代天球坐标系统的“入虚度”，具体说明古代山东主要地区的地理位置。《山川》以“路”为目，由大到小。山以益都山、般阳山、济南山为大目，诸路各山为小目。“益都山”下设“沂山”、“蒙山”等54个小目；“般阳山”下设“九目山”等26个小目；“济南山”下设“历山”等20个小目。同样，水以“益都水”、“般阳水”、“济南水”为大目，各路内的诸水为小目。《郡邑》以地为目。“益都路”、“般阳路”、“济南路”和“齐邑外属”为大目，州、县为小目。《古迹》则以类分目。大目有城郭、亭馆、邱垅三部分，每一大目之下，则以益都路、般阳路、济南路的次序分设小目。《风土》（实际只记述了风俗）以时为经，纵剖齐地历代风俗变化及其原因，独立成篇。《人物》则按人设目，依据朝代顺序，对所记齐地人物分别立传或简要介绍。《齐乘》纲目的设置，分门适中，归并得当，题文一致，首尾贯通，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检查。这和宋以前的志书多是类目并列，互不统属，或门类不用，以纲统目，以细目标题，偏于繁琐的总体设计，无疑是一大进步。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纪晓岚称赞该书“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实不愧为古方志的成功之作。

三

《齐乘》内容极其丰富，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举凡历史事件、著名人物、僧道隐逸、三教九流、风土人情、俚话传说、名山大川、亭阁楼台，辑而缀之，无所不包。全书记载齐地大小山脉102座，大小河流22条，并载有湖、泽、海。元代山东郡邑共记71座。其中州14座，县57座。作为古迹的古代城郭，共记有133座，每城因地记事，繁证博引，事实确凿有据。这对于了解和弄清山东历史的发展和古代城市的起源，都极有参考价值。作为古迹的亭馆，共载有94处。这些古建筑包括寺、庙、祠、观、宫，亭、台、楼、阁、厅、堂，宅院、书院，塔、桥等，内容翔实，蔚为大观，充分展现了齐鲁文化之邦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古墓葬载有63处。其中多数葬主如管仲、鲍子牙、晏婴、苏秦、扁鹊、左秋明、东方朔、郑康成等等系历史名人，史绩可考。

由于历史等原因，对于自然、社会诸方面的内容，《齐乘》并非都门类齐全，但许多重要内容，在所设的门类中则多有记载。在自然方面，如温泉的记载：即墨东北天井山，“平地三穴，汤泉出焉。若有风从西北来，则汤极热，不可入”；文登西七里昌阳汤，“名如意汤。文登有温泉七所，此为最”。又如济南泉水，名闻遐迩。个别泉水，如华泉，早在《史记》中就有记载。济南七十二名泉的记载，始于金代《名泉碑》，但此碑早已亡佚。金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济南行记》中说：“济南名泉七十有二”，并指出“爆流（即趵突泉）为上，金线次之，珍珠又次之”。只此而已。十分可贵的是《齐乘》把七十二名泉的泉名和位置翔实地记录下来，并明确指出，济南泉水远不止七十二个，而“以百计。涛喷珠跃，金霏碧渟，韵

琴筑而味舂醴，不殫名状。在邑者，瀦市之半，在郭者，环城之三，棋布星流，走城北阨，汇于水门，东流为源”。这些资料成为元代以后地方志书记录济南泉水的滥觞。再如《齐乘》对蓬莱海市的记载，也颇有价值。于钦首先指出：“海市常以春夏晴和之时，杲日初升，东风微作，云脚齐敷于海岛之上，海市必现。现则山林、城阙、楼观、旌幢、毡车、驼马、衣冠人物，凡世间所有象类万殊，或小或大，或暂或久、或变现终日，或际海皆满。”因为于钦多次去登州访海市，而且在秋季也曾见到海市，所以才有这些真切的记载。海市的记载，最早见于晋人伏琛的《三齐略记》，称“海上蜃气，时结楼台，名海市”。在此之前，《史记·封禅书》曾记载“三神山”。于钦正确地指出：“史、汉所称三神山蓬莱、方丈、瀛州，望之如云未至者，殆此类耳。且秦、汉入海方士仅能往来于矾岛之间，偶见此异，慕之为仙亦不为过。非若今人航海远泛黑水洋外，或飘荡岁月而后返，果有蓬莱仙山，何不闻也！斯言足破千古之惑矣。”另外，于钦在记载益都云门山时，称“崖壁上衔蚌壳结石”，山为“海田所变”，也是十分正确的。

属于社会方面的内容，《齐乘》亦颇多记载。物产有莱芜、文登等地的铁矿；栖霞境内的黄银矿；长清产的中药半夏，胶州产的中药桔梗、防风、乌头、天雄；文登沿海的海牛、海驴、海狸；青州种植的牡丹，并有“青州富庶，地宜牡丹，春时游乐之盛不减洛阳”的记载。艺文类的记载尤多，举凡碑铭、石刻、诗词、神话、传说等等，无不涉猎。其中有古代书法佳品、南唐著名书法家徐铉摹秦峰山石刻“皇帝立国维初”六字及其镌刻的来龙去脉；有不载于他籍的诗词佳句。艺术上颇值得称道的有：宋人张在咏青州牡丹的七绝：“南邻北舍牡丹开，年少异芳去几回。惟有君家老柏树，春风来似不曾来。”宋人咏蓬莱阁的《秦楼月》词：“烟漠漠，水天摇荡蓬莱阁，蓬

莱阁，朱甍碧瓦半浸寥廓。三山漫有长生药，茫茫云海风涛恶。风涛恶，仙槎不见，暮沙潮落。”于钦本人的诗作有三首。其一，咏济南的七绝：“济南山水天下无，晴云晓日开画图。群山尾岱走东河，鹊华落星青照湖。”其二，咏博兴秋景的五言律诗：“霜风收绿锦，万顷水云秋。海气朝成市，山光晚对楼。舟车通北阙，图画入南洲。且食鲈鱼美，吾盟在白鸥。”其三，游东方朔庙作的七律：“甲乙不焚珠璧帐，百钱囊粟且婆娑。殿前怒擗黄金戟，天下偷将紫玉珂。班固有评真率尔，子云禄隐果如何。汉初除郅椎秦手，只许先生逸网罗。”此外《齐乘》还收入了不少神话传说，其中有杞梁、孟姜女的传说；秦皇、汉武帝巡的传说；王祥卧鲤、老莱子、韩娥鬻歌、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等。值得一提的是，《齐乘》中记载了现已散佚的一些古地理书内容。其中，引用晋人晏谟所撰《齐记》近20条内容，晋人伏琛所撰《齐地记》、《三齐略记》各3条，金人李庆余所撰《齐记补》10条。这些摘引，虽属片断资料，但对研究原书情况有一定参考价值。

四

《齐乘》系地理总志，它以山川、郡邑为主线，包容了自然与社会的丰富内容。作者对史料的取舍以及在撰写上有许多特点：

1. 博引众书，注重考证。山东历史悠久，古书颇多记载，于钦创一方之志，充分利用前人成果，把各种类书中有关齐地分散、片断的记载集中起来，分门别类，整理鉴别，加以利用，全书所引之书达210部之多。于钦生于齐，官于齐，熟谙齐地事物，因此他能够“周览原隰，询诸乡老”，对资料“考订古今，质以见闻”，对古书的记载去伪存真，正误纠偏，使事实确凿有据，

同时也鉴别了不同古籍在记载上的孰是孰非。《齐乘》卷一“龟蒙二山”条目中，于钦引用《鲁颂·閟宫》“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和《夫子龟山操》“余欲望鲁兮，龟山蔽之”的记载，加以考证，肯定了龟、蒙二山为鲁之大山，纠正了其后续隐没龟山之本名，而代之以蒙山、东蒙山之讹误。《齐乘》卷二“天齐渊”条目中，于钦繁证博引，纠正了《汉志》“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的说法，正确地指出：“齐者，水之旋纹，今人之谓旋窠，状类腹齐。岂渊泉并出，旋流如齐，以其祠天，称曰天齐邪。抑天然渊水，犹曰齐之天渊云耳。且临淄非天地之中，何谓之天之腹齐？深与天齐尤觉诞妄！”《齐乘》卷四“龙兴寺”条，考证了宋碑“寺即田文宅”的错误，系出自唐封演《闻见记》“青州城南佛寺，旧传孟赏君宅”的记载，并考证出该寺“乃南史刘善明宅”的正确结论。如上所举，在《齐乘》中岂此二三！故近代学者梁启超称赞《齐乘》：“援据经史，考证见闻，较之他志之但据舆图凭空言论断者为胜。”

2.以地系事，因事记人。于钦在记述齐地山岳形胜、河川吐纳、城邑变迁、建置沿革中，“采集参究上下数千余年”，把自然、地理与人物活动、朝代更迭、风俗变异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事实于记述之中，从中反映出事物的规律性，同时也反映出作者的立场、观点。正如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所说：“予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齐乘》诸条目中，自三代两汉至元朝，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凡涉及者都有所反映。如卷三“德州”条，在记述德州历代沿革时，记述了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平原太守颜真卿据城讨贼”，并在小注中，引用唐明皇叹河北二十四郡县皆从贼，独颜真卿讨贼，却“不识颜真卿作何状，乃能如是！”于钦接着写道：“自古识者不贤，贤者不识；信者不忠，忠者不信。岂特明皇而已哉？！”

此祸乱所以相导也。”作者“用心”跃然纸上。又如卷四“临淄古城”条，即有其全盛时期繁荣景象的记述，又有齐宣王聚游说之士，繁荣稷下学术的事实，从中不难看出一个国家政治的稳定与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的密切关系。卷五“百花桥”条，于钦记述了唐、宋时济南多名胜，到元朝时“亭馆隳废，百无一二”，感叹民俗每况愈下，对古迹的破坏熟视无睹，“且戚戚于矫饰、汲汲于资级，以此驰骛一世反有窃笑古人者矣”，因此，在卷五《风土》中，于钦崇尚“唐虞三代风化尚矣”，赞扬两汉齐鲁古国人才倍出，使“齐鲁之俗，好经术、尚礼义”。他认为每个朝代、每个地区，“其大善恶、大趋向，则系乎一气之运，一代之治”。同时引用司马光的话：“上行下效之谓风，薰陶渐渍之谓化，沦胥委靡之谓流，民心安定之谓俗。”从而得出“夫教化、薰陶固系于上”的断语。凡此种种，堪称史笔。

3. 记人不阿，爱憎分明。秉笔直书，不避权贵，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编撰者史德、史识的差异，在史志书中隐恶扬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甚至善恶颠倒的弊病，也是屡见不鲜的。于钦，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虽然也摆脱不了封建正统思想之羁绊，甚至“独宗孟氏”，然而综观《齐乘》全书，在治学原则上，不曲意雕饰，不巧作涂饰，记人不阿、爱憎分明，特别是关于政治内容方面的记载，大都是于氏得之于亲身的闻见，较为翔实可信，这些记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动态，为后世所重视。

《齐乘》全书记载数百名历史人物。卷六为特设的人物篇，仅该卷中的人物就有近270名。于钦曰：“人物非贤才不书。”根据这一立传标准，所谓贤才的政治和道德标准，可以概括为忠、孝、节、义四个字。符合这一标准的，无论是公侯、将相，武夫、小吏还是释道、隐逸、乡老、妇女等都在记述

之例，并无门户之见。对历代褒贬不一的人物，能直抒己见。故而明朝嘉靖年间，为《齐乘》作序的青州府知府杜思赞扬曰：

“其尤得者，黜齐奴、退少翁，表轅（固）、邹（阳），辨王（吉）、贡（禹），贯师范、罪张宾。”金朝的元好问，是一位有名的爱国诗人、作家。但是他对北宋末降金的“伪齐”刘豫表示同情，在看到刘豫于平阴 龙泉寺的题留后，作诗曰：

“河边叛党尚能飞，无角无麟自一齐。甲子纷纷等儿戏，壁间付笑阜昌题。”于钦对元好问的失误，予以尖锐的批评：“豫在当时自有定论，遗山何故曲为之说？党恶如此，岂不为断腕后所笑邪！自古经生文士，学博才高，而性癖识陋，害理者不少，如遗山之流，可不戒哉。”爱憎分明，是非厘然。

于钦长期居官齐地，亲眼目睹元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他对官僚、污吏对人民的危害深恶痛绝，主观上总希望解除一些人民的痛苦，缓和阶级矛盾。因此，凡是对人民作过好事的（如赈济灾民），他必大书特书。“卷六”之中就特载了3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先贤行迹多不载，惟赈恤一事，自子奇、王望、半千三人，皆详书之。”于钦还记述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齐地大饥、父子相食”。于钦奉命赈济济南六县灾民，因令富户“出粟太多，赈济太广”，而“遭宪府谴责”。当时官僚们“幸此凶岁”，趁火打劫，“损斗升买人子女”，卖于北方。于钦“则访鬻子者为赎还之”，因此更遭宪府怒骂。于钦愤慨至极，将此事详细记之。同时慨叹：“人微无肯信其言，官小莫能行其事！”在卷一，他写了一段齐宣王在杜山遇13个老人的事。宣王要赏赐他们，先赐其不租，又赐其无徭役，其中一个叫闾邱的老人均不拜谢。宣王不解，老人说：“望得富、贵、寿”；“选良吏、平法度，臣得寿矣；赈乏以时，臣得富矣；令少敬长，臣得贵矣。”这些直笔惊语，既反映了作者的史德，又反